

■ 政治学理论

论人性观与政治体制设计

李 荣 华

(深圳行政学院 行政管理学教研部, 广东 深圳 518021)

[作者简介] 李荣华(1959-), 男, 湖北嘉鱼人, 深圳行政学院行政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 主要从事政治制度研究。

[摘 要] 人是社会活动最基本的要素, 政府是治理社会的权威组织, 因此政治体制的设计离不开对人性的认识, 离不开政治思想的支持。纵观西方思想家关于人性的论述, 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在认定人性具有欲望、私念的前提下来对政治制度进行设计的。一方面, 他们认为人性中有不完善的一面, 因此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使政治体制能抑恶扬善; 人性有弱点, 为避免它对社会造成损害, 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另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人性的弱点, 化害为利, 使之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 人性观; 政治体制; 设计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2 \ | 0254-06

人性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休谟对此有过精辟论述, 他说: “显然, 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 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 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 (第 6 页)。基于人性在科学中的作用, 他还认为如果我们对人性有了透彻的把握, 我们在其它学科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因为他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惟一稳固的基础^[1] (第 7-8 页)。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随着研究的深化, 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对人性进行了探讨。政治学研究中也有学者在著述中不同程度地论及人性, 特别在研究西方政治体制时注意到人性观与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但对人性在政治学科中的基础作用还缺乏系统的探讨, 因而有必要对西方政治学家对人性的认识系统地梳理, 以揭示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人性观以及这种人性观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互动关系。

一、西方政治思想家笔下的人性观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他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创立了政治学理论体系, 该书详细地研究了国家的一系列问题, 奠定了政治学的基础, 确定了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并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政治学研究, “我们现在对政治学所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范畴, 在《政治学》一书中都有过论述”^[2] (第 13 页)。由于政治理论的探讨、政治体制的设计、实际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认识,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屡次直接或间接地论及人性。他说: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 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 而忽视公共的事物; 对于公共的一切, 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它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3] (第 48 页) 他又说: “人类在各种场合, 作为伙伴而共同作业和生活, 一般都是不容易的, 在涉及财产时尤其会发生许多苦恼。”^[3] (第 54 页) 从这些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亚

里士多德对人性描述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人性观多基于其经验的观察。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多侧重揭示人性中自利、嫉妒的一面。他说:“大家听到现实的种种罪恶,比如违反契约而行使欺诈和伪证的财产诉讼,以及谄媚富豪等都被指斥为导源于私产制度……实际上,所有这些罪恶都是导源于人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3](第56页)他还说:“人类的恶德就在于他那漫无止境的贪心,一时他很满意于获有两个奥布尔的津贴,到了习以为常时,又希望有更多的津贴了,他就是这样永不知足。”^[3](第73页)至此,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认识可以说是跃然纸上了:他认为人性中充满了自利、欺诈、贪心、嫉妒等恶习德。那么人性中为什么会有这些恶习德呢?为什么人性中利他、诚实、博爱等“善”的因素比重不足呢?他在上文里已否认是私产制度的结果,认为即使“实行公共财产制度也无法为之补救”,因为它“导源于人的罪恶本性”,导源于“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是出于天赋”^[3](第55页)。一言以蔽之,人天生具有恶习的本性,是一种“天赋”,非后天所为。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人,是古代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学家,那么可以说霍布斯是政治学中划时代的人物,是“近代第一个政治思想家”^[4](出版说明,第8页)。霍布斯的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人性与人类社会的政治治理密切结合,可以说人性观是霍布斯的政治理论的逻辑前提,因为“他的全部政治理论是从他的人性观和自然法学说两个出发点推导出来的”^[4](第9页)。他在其政治理论代表作《利维坦》一书的“引言”中说,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必须要了解全人类,为此他对人性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且把“论人类”作为全书四大部分之一放在篇首,用了十六章的篇幅来“论人类”。霍布斯的人性观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他认为人是利己的,有许多欲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些予以充分的理解。他说:“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4](第72页)。他还说:“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4](第9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布斯对人性中的利己、欲望的认识。与此同时,他充分理解人性的这些缺点,并试图寻找原因为之辩护。他在分析人性中的权势欲时说:“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4](第72页)他说:“财富、荣誉、统治权或其它权势的竞争,使人倾向于争斗、敌对和战争。”^[4](第73页)总而言之,外部世界竞争的残酷性使得人性自利,各种欲求不断增长,因为没有权势的不断增长,眼下取得的地位便保不住,故而这些人性中的瑕疵是可以理解的,是不应受责难的。因此他说:“我们彼此都并不谴责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欲求及其它情感,本身实不是罪恶。”^[5](第283页)

霍布斯的人性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他对人性基本是作客观的描述,故而很难说他的人性观是绝对的性恶论。如上所说霍布斯对人性中欲望的成分表示理解、体谅,所以他对人性中的欲望成分没有过多的指责。在他看来,“这些善恶等字眼,常依乎用这些字的人的关系而运用,没有事物是简单地、绝对地为善的或为恶的。这善与恶的规则,在没有政府的地方,是以人的本身取得的”^[5](第658页)。这就是说,各人都把对自己有利的称之为善,反之则称之为恶。客观地看,霍布斯的基本观点是人性中欲望的成分比较多,如永无休止的权势欲、财富欲、追求安逸之欲,追求肉欲之乐之欲、喜好赞誉之欲、虚荣心、利己心等^[4](第73-75页)。但人性中好的一面也不少,如爱知识、爱艺术、爱自由、有理智、希望安全、爱和平等^[4](第73,128,129,133页)。这些喜好是不能称之为恶的,故此我们简单地将霍布斯的人性观归于人生恶论是不妥当的。与其说霍布斯所持的是人性恶的观点,毋宁说霍布斯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人性的善恶两个方面都作了较认真的探讨,只是对人性中的欲望等方面揭示得比较多一点而已。

霍布斯的人性观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人性论比较深刻、系统。说他深刻,是因为他对人的内心深处有足够的体验与思考。他在《利维坦》一书的引言中,呼吁人们认识自己,要了解别人是怎样想的,就要思考自己处于同样条件下是怎样想的,认为只有探究人心的人才能知道别人的思想感情^[4](引言,第2页)。毫无疑问,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说:“人们隐秘的思想是无所不包的,无论是神圣的、褻渎的、圣洁的、污秽的、庄重的、轻佻的事,莫不尽有,既没有羞愧、也没有谴责。”^[4](第52页)人们在“公事方面,他们考虑得更多的却是自己的才智的声誉,而不是他人事务的成败”^[4](第35页)。“人们不但根据自己衡量

别人,而且根据自己衡量一切其它物体。”^[4](第 6 页)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人性的深思,是很难有此对人性的洞察的。说霍布斯的人性观比较系统,是说他对人性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以此作为他的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点。在他的政治学名著《利维坦》一书中,他专辟 16 章来论人类,对人性的特征、内容、形成原因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以此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环节“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由于外在世界的竞争压力使得人性中自利、欲望的成分日益增长,这就使得自然状态争战不已,人与人之间像豺狼一样。但是人性中的另一面,求安全、爱和平使得他们要寻找一种方式来“保全自己并因此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4](第 128 页)。从逻辑上讲,自然法应是人性中求安全、求和平的合理推论。因为自然法的核心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人与人仅仅是像豺狼一样而没有求安全与和平的另一面,那么人们是不会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自然法的精髓的。正是因为有求安全与和平的人性的另一面,人们才遵守自然法,“利维坦”(国家)也才得以产生。基于此,可以说霍布斯的人性观较之其它思想家更深刻、更系统,构成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无法与之比拟。如亚里士多德也探讨过人性,但其深刻性与系统性是无法与霍布斯相比的。况且从理论体系上来说,亚里士多德及霍布斯以后的政治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都只是散见于其它政治观点之中,比较零碎,没有成为其政治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

孟德斯鸠是三权分立的集大成者,他的人性观的最大特点是紧密围绕政体来论述人性。他在为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一书所作的说明中特意说到他“谈到的‘善人’,并不是基督教上的善人,而是政治上的善人”^[6](第 40 页,著者的几点说明)。他认为,人性表现在政治上是往往滥用权力。他说:“在共和国里,当一个公民获得过高的权力时,则滥用权力的可能也就更大。”^[6](第 14 页)针对此,他开的药方是:“一切官职,如果权力大,任期就应该短,以资补救”^[6](第 14 页)。他从政体设计上的相应措施是“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迫他做的,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6](第 154 页)。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保证自由是三权分立的精神实质,其目的就是扼制人性在政治上的恶性:滥用权力,侵犯人们的自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德斯鸠探讨人性是为其政体理论服务的,其人性论在政治上表现的假设前提是性恶论者。

如果说以上思想家是密切联系政治理论、政体设计来探讨人性的话,那么黑格尔则偏重于从哲学的观点来探讨人性。他是哲学界的泰斗,是辩证法的大师,故其人性观中闪烁着辩证法的精神。对人性善恶这一历史上争论不休、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他的认识与众不同,有其独到之处。

他把道德与自由意志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是自由在人的主观内心的体现,人有了自由意志,他能自由为善,也能自由作恶。所以,他认为人既是善的,又是恶的。他说:“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从它们是内在的从而是肯定的来说,是善的。所以说人性本善。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自然规定,一般地与自由和精神的观念相对立的,从而又是否定的,所以必须把它们根除。因此说人性本恶。在这个观点上,决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主张,都是主观任性。”^[7](第 28 页)一方面,人的意志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必要环节,所以说人性是善的。他在谈到不法问题时说,当一个人面临饿毙的时候,他可以去偷一块面包来拯救自己的生命,这并非不法,相反,“克制而不为这种不法行为这件事本身是一种不法,而且是最严重的不法,因为它全部否定了自由的实在”^[6](第 130 页)。另一方面,维持生命毕竟是一种自然需要,它是精神得到自由的必要条件,却不是自由本身。但是如果把这种自然需要加以普遍化,那就势必扼杀精神的自由,从而人的这种自然需要又具有恶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既是善的,又是恶的,善与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绝对地采取任何一种说法,都具有片面性。所以,他说:“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6](第 144 页)可见,黑格尔反对形而上学的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纯善,而是善与恶的混合物,他还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说出了恶在人性中的位置。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他的认识较之单纯的性善论或单纯的性恶论都更全面,更深刻。

二、人性观对西方政治体制设计的影响

从人类社会的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相互影响。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演变过程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思想对其政治体制的形成影响非常直接,而英国的政治体制对洛克、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者而言,政治思想对政治体制的设计这种影响就更大,可以说政治体制是政治设计者之政治观念的外在表现。在西方的政治思想文献中,《联邦党人文集》是一群政治体制设计者的政治理念的集成,因而书中更具针对性地对人性与政治体制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对联邦党人的人性观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性观对政治体制设计的影响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政治体制的设计及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上,是其将对人性的认识转化为政治体制设计的规则,所以本文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来说明人性观对政治体制设计的影响。

如果说联邦党人是美国宪法的辩护人,那么可以说《联邦党人文集》就是美国宪法的辩护词。联邦党人站在拥护宪法的立场上,极力驳斥对宪法的责难,力陈宪法符合人性,呼吁人们投票支持宪法,期待着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

首先,他们认识到人性有恶的一面,所以注重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强调权力制衡。在谈到分权以防止政府的弊端时,他们说:“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控制了”^[8](第264页)。这段话对人性揭示的核心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因为纯洁的天使是无须他人来管理和约束的,而公民不是天使,即人都是不完善的人,因而权力成为必要,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洛克语)。另一方面,“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即被统治者也不是天使,因为纯洁的天使是不会专制、不会滥用权力的。统治者不是天使,因此权力不能过于集中,过于集中就可能导致腐败。正因为人性不可靠,而权力又是由人来掌握的,难免被用来作恶,所以权力需要制约,而制约权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用野心对抗野心”。

其次,人性有恶的一面,但即使这样也并非一无是处,人们可以对此加以利用,化害为利,人性的两面都要加以利用。联邦党人在设计美国的政治体制时尽量利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并巧妙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为政府有效运转服务。在谈到总统不能连任的弊端时说,如果总统不能连任,那么他就失去表现好以利连任的动力,从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寻找机会中饱私囊;倒不如准许其连任,利用他渴望连任的欲望,恪尽职守,从而调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克服人性中的消极因素,以达到抑恶扬善,服务于政府的目的^[8](第368-369页)。在谈到总统及参议院的责任感时说:“举凡可以影响人类思想的一切理由,诸如荣誉、誓言、声望、良心、爱国心以及家庭情感,均足以保证其忠于其事”^[8](第331页)。再加上弹劾、2/3多数、三权分立等政体机制来保证人性中好的方面得到发扬,人性的弱点可望得到抑制。在谈到立法机构中可能会有人只顾自己或本地区、本行业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其他人的利益和主张时,他说:“我们相信,为了人性的荣誉,我们将看到这类生气勃勃的幼苗在联邦立法机关和州的立法机关的土壤上繁荣增长的例子”^[8](第172页)。人们喜好赞颂、荣誉,而这些恰好可以被利用来促成人们将一己之利置于社会的公利之下。联邦党人的这一思想仍为当今的美国人所接受,他们说:“我们不相信谁是天使,而宁愿相信大家都是魔鬼;但是当魔鬼们互相监视时,大家彼此受惠,或许就都成了天使”^[9](第16页)。

第三,充分利用人性来设计政治体制,弘扬法治,主张以法的形式来保证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联邦

党人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揭示比较含蓄,尽量用比较委婉的语气来表述对人性的疑虑。一方面,他们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揭示,比如在谈到每个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著名的法制原则时,他们说:“没有一个人被准许审理自己的案子,因为他的利益肯定会使他的判断发生偏差,而且也可能败坏他的正直为人”^[8](第 47 页)。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有自利的倾向,自利使人可能在审理自己的案子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8](第 75 页)。正因为人性中有自利的倾向,仅有道德秩序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主张法治,将政治体制的设计在对个人自由的保障的基础上,以严格的法律管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所以最好的政府应当是法治的政府。法律按其外在表现来说是种规范,而规范就是界限,失去了界限,人的行为就会因无所据守、无所约束而变得无所不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会被为所欲为的无序而困扰。而依靠法治不仅能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而且还能正视现实中人性的冲突,不对人们提出人性所不能承受的苛求,用法律来约束权力持有者的种种不良的人性,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三、人性观之辩证及其启示

在西方,虽然持性善论者不乏其人,但性恶论一直居于主流,可谓源远流长,从宗教领域里的“原罪说”到世俗政治思想家的人性观,无不充斥着对人性的不信任。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休谟,可谓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总是自然地追求金钱、地位和权力。在政治生活中,权力同地位、荣誉、利益密切关联。总之,权力是诱人的,人们自觉地抵御权力的诱惑,不专权、不滥用权力的能力是很差的,大部头《剑桥近代史》的主编阿克顿甚至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10](第 342 页)。所以,在政治权力的运用上,任何自我控制和“德性”都是不可靠的。因此,在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政治思想家创造出分权理论、法治理论,而政治体制设计者则将其付诸实践。

在中国,从孟子开始一直是性善论居于主导地位。孟子明确提出人性善的观点并对之加以论证。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1](第 96 页)。孟子建构性善论虽非通过形式逻辑,而且以后又有韩非、荀况等人对性善论提出异议,但孟子的性善论为董仲舒、朱熹等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并加以发挥,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人性善的观点深信“人人皆可为尧舜”,而且按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统治者居圣人之性,就更是善上加善,所以中国政治体制领域难以形成法治的社会环境。政治的精髓被看做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核心是“内圣外王”,认为有道德高尚的君主再加上一些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政治就会清明,而法治反而会束缚明君贤臣的手脚,人治更能发挥统治者的才能,法治与分权制衡则是多余之举。正是中西人性观的差异,中国形成了绵延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和官场化社会,而西方则创造出了民主政体和市民社会。

与以往在行为上对人性的自私或利他的争议相比,现代生物学从纯科学意义上对人性进行研究可能更科学,因为性善论者可以列举一些明显利他的例子,而性恶论者则可以列举一些自私的例子,两者各执一端,谁也不能说服谁,所以人性论的争端持续了几千年。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的研究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其基本的构成单位是基因,在形成个体的过程中,基因必须拼命地展示自己,实现自己的复制,如果基因不为己,它将根本不能生存,所以道金斯经过科学研究,在《自私的基因》中说:“成功基因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无情的自私性。这种基因的自私性常常会导致个体的自私性”,“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12](第 3, 44 页),人性的自私与这种生物基因的自私具有客观性,这一点是很难否认的。但是自私是否就是“恶”,还要看具体条件。如果他的自私在其生存和发展中,不妨碍他人的生存和发展,不构成对他人的侵害,人性自私可能为“善”。但是如果它的自私在其生存和发展中妨碍他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他人构成侵害,那么自私就可以称之为“恶”了。基于此,正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给予人性正常自然发展的空间,但又不能让其泛滥,这就需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需要法治;同时发扬人性中美好

的一面,因为良好的道德,特别是官吏的道德永远是社会政治的重要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治也是必要的。所以从现代生物学对人性的揭示来看,治理国家需要德治,更需要法治,要使国家的治理与人性相适应,法治和德治都是必不可少的。

[参 考 文 献]

- [1] [英]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 王惠岩. 政治学原理[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 [3] [希]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 [4] [英] (霍布斯. 利维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5]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 上卷[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6]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7]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8] [美] 汉密尔顿. 联邦党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9] 王建芹. 强化监督 制约权力[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 [10] [英] 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1] 关立勋. 孟子名言译评: 之二[Z].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
- [12] [英] 里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叶娟丽)

Human Nature & Political System Design

LI Rong-hua

(Shenzhe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Shenzhen 518021,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LI Rong-hua (195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henzhe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majoring in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facts that human being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of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at government is the authority organization of administering the society, political system can't be designed with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support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various expositions on human nature by western thinkers, it is not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discover such a fact that they have been design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basing on the premise that human being is of lust and selfishness. On the one hand, they think that two aspects on human nature must be considered while designing political system. One is its imperfection, which must be considered to make designed political system to practice the function to curb the evil and promote the good, and the other is its weak point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power must be restrained so as to avoid its harm to th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think that one must make full use of its weakness to turn its harm into the good, and serve the society.

Key words: human nature; political system; design